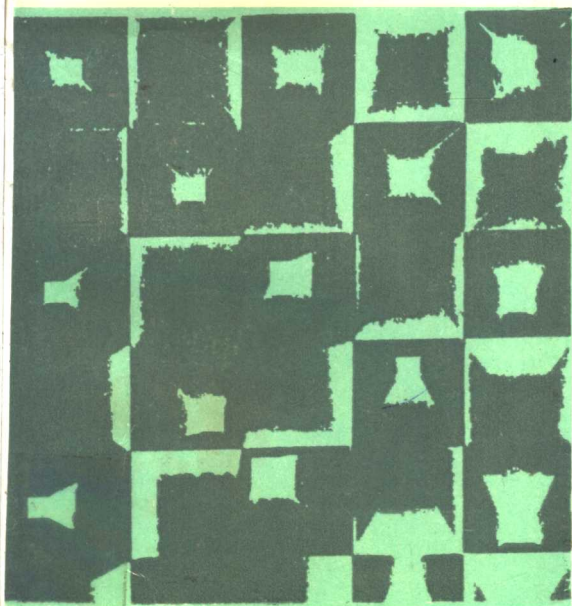


孙培青 李国钧 主编

沈灌群教育论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灌群教育论稿

孙培青 李国钧 主编

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 灌 群 传 略

沈灌群（1908年12月10日至1989年2月25日），号子元，江苏省如皋县人。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出生于一个三代小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秀才出身的塾师。5岁时随父就塾发蒙，从小读书勤勉。因家境清寒，遂于1918年8月进免费的如皋县商会私立乙种商业学校（属于艺德教育性质的一种职业学校）就读。5年后又考入膳宿全免费的江苏省立第二代用师范学校（后改为江苏省立如皋师范）。学校有几位中国古典文学造诣较高的教师，引导他打下了厚实的国学根基。在校期间，适逢孙中山先生逝世和“五卅”运动，沈灌群开始接触革命的三民主义，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参加反帝游行、宣传演讲和抵制英、日货运动，并加入了进步学生团体——“劲社”。

1928年秋，在如皋师范高二肄业，沈灌群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系。4年里，他广泛听了系内外许多课程，课余还偷偷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尤爱读杨贤江（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及其他介绍苏联教育的书刊，并与进步同学讨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很想尝试用新的观点去研究中国学校和教育史上的问题。1930年大学二年级时，他写下了自己教育理论方面的处女作——《今后中国的新教育和中国的教育者》（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立下了为祖国教育事业献身的志愿。他具备较扎实的国学基础，且又读过众多教育课程，鉴于这些条件，他有志于将来能入大学工作，专攻和讲授中国教育史。从大学二年级起，他还热心学生工作，先后担任中大教育学院和校学生会常委，积极投入学生爱国运动。大学4年中，他以优良

的成绩免缴学费，又半工半读，靠担任学校演讲速记、兼任中学教员和投稿所得，补贴生活和学习费用，顺利读完大学。

1932年8月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含幼儿园、小学、中学）工作6年。先后任教员、研究室主任、教务主任、《实验教育》季刊主编。他很注意教育实验，发表了多篇中小学实验报告和其他教育论文。1937年春，受学校派遣参加江苏省日本教育参观团赴日考察3个月。返国后不久，抗战暴发，中大实验学校迁贵阳。

此后，沈灌群在武汉经考试，进入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任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后又任高教司《高等教育季刊》编辑和大学课程编审等工作，共6年半。并兼任国立艺专和国立音乐学院副教授，讲授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课程。

在重庆期间，他常与追求进步的好友相聚，看书、读报、谈时势。他们读《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读《联共（布）党史》、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们对延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报导感到鼓舞和希望，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等一系列惨案感到愤慨。所有这些，对沈灌群思想的发展有很大促进。

直到1944年冬赴美之前，沈灌群先后在多个教育部门从事过多种工作，积累了12年社会工作的阅历，为他日后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他的论著大致包括教育实验、教育史和教育学等几大类，他尤其对教育实际问题表现出兴趣。他在论著中表现出对旧中国的不满和对新社会的憧憬。如1932年，他与人合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教育论著——《教育社会学通论》，其中有专节《理想社会与教育》，指出“所谓理想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言，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理想社会的教育”，应当“不是阶级独占的”、“与劳动相密接”的教育。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初步表现。

1944年12月，沈灌群远涉重洋赴美国留学，入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攻读西方教育史及比较教育专业。经一年苦读，以学位论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中等教育》于1946年春获硕士学位。旋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深造。留美期间，他更广泛地阅读了西方教育史、比较教育和教育哲学著作，更多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苏联及东欧等国的书报。他还广泛接触了美国社会。他与黑人同学交往、与宿舍值夜老更夫交友、与开饭馆的旅美华侨交谈、与留美同学座谈交流、还去美国东南部一些学校参观，使他看清所谓美国民主教育，实际上还存在种族歧视等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使他了解到海外华侨的苦境和他们热爱祖国、盼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并感受到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友好交往的愿望。尤其是他目睹当时席卷美国东西海岸的海员大罢工，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矛盾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对李大钊先生当年的预言：“将来的世界一定是赤旗的世界”倍感亲切。留美2年，他不仅提高了教育学和教育史的理论素养，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和更自觉的接受。因此，当祖国处在风雨飘摇、生灵涂炭的危亡关头，他毅然回到上海，欲为祖国的振兴贡献力量。

1947年1月底，沈灌群回到上海，受聘为复旦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先后为系内外开过西洋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逻辑学、教育学、中等教育、四朝学案选读等课程。从那时到解放的2年间，他还应《中华教育界》之约写了不少比较教育论文，客观地介绍了西洋各国的教育现状，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育成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与上海人民一起发自内心地欢呼解放。他年过40，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满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参加了复旦大学接管后清查委员会工作，参加了上海市高等学校工会工作学习班，参加筹组复旦大学工会；他担任教务处注册组

主任工作；他写文章称颂新中国的诞生，他以全付身心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教育的事业中。

1950年8月，复旦大学党组织派沈灌群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1年，有良师指引，益友切磋，获益非浅。在那里，他得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教育学等课程，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了自己，为日后研究中国教育史创造了条件。

从人大回复旦后不久，全国高校院系开始调整，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他即随复旦大学教育系全体师生入师大。就此开始了他在华东师大近40年漫长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科研活动，实现了自己早年的夙愿。

从1952年初到“文化大革命”，沈灌群长期担任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先后讲授中国教育史、教育学、中国古代教育论著选读等课程。当时，中国教育史还是一门年轻学科，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教学和研究还有待于人们去开拓。对此，沈灌群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10月他拟出了建国后第一份《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草案）》，作为华东师大教育系教学之用，并报教育部备案，后又由教育部推荐给各兄弟院校参考。这份大纲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说明中国教育史这门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内容体系和课时安排，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和课程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教学需要，他还编写了大量讲义，包括中国古代、近代教育史和部分现代教育史、中国历代教育论著选读等，总计约200多万字。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他笔耕不辍，在中国教育史这块园地中取得了不少具有拓荒意义的成就。

1956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灌群所著《中国古代

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也是第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专著。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欢迎和重视，先后发表专文，一致给予好评。1958年苏联出版了俄文译本。在短短几年里，此书在国内曾数次重印。在长达20余年中，该书长期为一些高等院校用作中国古代教育史教学用书，直到80年代初期，仍有学校在继续使用。现今国内一些著名中国教育史家在谈及自己的成长道路时，常常会以感激的心情提起这本书，认为，就是在此书引导下才走上研究中国教育史道路的。这本书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和建国后一代中国教育史学者的成长，实起到启蒙作用。

从1955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创刊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沈灌群一直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在50年代的数年间，他在《学报》上发表了一些重要论文。他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李大钊（《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教育活动和教育观点》，1959年）、鲁迅（《鲁迅的教育思想》，1955年）和王充（《王充的教育思想》，1957年）的教育思想，肯定了他们作为教育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意义。他也是建国后较早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孔子（《伟大的教育家孔子》，1957年）、《学记》（《〈学记〉——中国古代学校的教育和教学经验总结》，1956年）重作系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在《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文中，他肯定了孔子教育思想的人道主义、人民性特点及其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卓越贡献。20多年后，此文被作为建国后研究孔子教育思想有代表性的论文，选入《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选（1949—1980）》（由中央教科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而他也因此文在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受到种种非难。

50年代是沈灌群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他的具有开拓

和创新精神的学术研究，很为学术界重视和肯定。他以自己的劳动，确立了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教育史学家的地位。

正当他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事业继续作出贡献的时候，那场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到中国大地，他个人与家庭都深受其害。沈灌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在北大读书的爱女竟被迫害致死，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即便如此，也未能动摇他热爱祖国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的信念。一旦形势许可，他仍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参加了《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古籍的整理和校改研究工作，承担了外文资料翻译工作，还撰写了一些中国教育史论稿。

渡尽劫难，祖国迎来了明媚的春天，而沈灌群却步入了人生的秋天。他常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劫余甘为人梯”的辞句自勉，焕发出青春活力，在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丰收，形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1977年他写下了《唐代的科技教育》一文（载《教育研究》1979年第1期），开中国教育史界注重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风气。在此后短短几年里他撰写、重写和改定了大量论著。其中有：《我国远古时期的教育——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的生产劳动教育》（1982年）、《夏商西周奴隶社会的教育》（1982年）、《周秦之际中国社会向封建制发展中的教育》（1982年）、《孔子的教育思想》（1982年）、《墨子的教育思想》（1982年）、《孟子的教育思想》（1982年）、《班昭与〈女诫〉》（1980年）、《李贽论妇女和妇女教育》（1980年）、《再论李大钊的革命教育思想》（1978年）、《胡适的教育思想初探》（1979年）等，出版了专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参加修订并出版了集体所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出版），总计约40万字。以一位年

逾70的老人而能有如此丰硕的收获，可以想见他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不仅如此，1983年初，山东教育出版社约请一些中年中国教育史学者发起组织撰写通贯古今的学术性专著《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组织者之一的中央教科所韩达同志专门来信，恳请沈灌群“鼎力支持”这项工程，与毛礼锐教授共同担任这部书的主编。得此信息，他甚感鼓舞，欣然表示：“敢不献我绵薄！”同年秋，上海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中国教育家评传》（3卷本），韩达再次来信请沈灌群仍与毛礼锐共同担任此书主编，他仍慨然允诺。此后几年，他拖着曾经右股骨粉碎性骨折的衰弱之体，南来北往。1984年11月他抱病坚持审阅《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文稿，直到审定交出，才去医院治疗。他为《中国教育通史》和《中国教育家评传》二书的撰写与出版付出了辛劳与健康。如今二部书全部出齐。《中国教育通史》是国内第一部从中国远古教育的发生，写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巨著，它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数千年中国学校、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和客观的介绍与评价，体现了理论与历史、思想性与科学性、批判与继承的统一。《中国教育家评传》介绍、评价了从古代周公、孔子到现代徐特立、陈鹤琴等50位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它以评为主，评传结合，史料丰富、翔实，观点鲜明，富有创见。二部书集结了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代表了8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水平，向世界系统介绍了中国教育历史遗产，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国教育家评传》还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1989年9月）。

晚年的沈灌群还为培育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后继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从1982年起他领头与孙培青教授、李国钧教授一起合招研究生，到他去世时，共招了二届硕士生、三届博士生，共8

人。他坚持亲自为研究生授课和指导学位论文。以他30多年的中国教育史造诣、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理论素养，讲授学位课程是驾轻就熟的事，而他却从未有丝毫懈怠，每一课都认真准备，新编讲稿，娓娓道来。思想活跃，语言幽默。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十分强调研究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重要，要求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专业知外，凡古代文、史、哲及版本、目录、文字、训诂、史料诸学皆须知谙。他要求学生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和评价历史上的教育现象。他从不以己之见限定学生思想，而是十分赞赏和支持他们在学术上的探索，并能从善如流，颇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他和蔼慈祥，爱生如子，不仅是学业，学生们的生活他也都乐于关心，并常开通地指点一二，被学生视为可亲的老人。他对学生爱之深、愿之切、助之诚，使一代新人成长起来，有些学生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不仅是及门弟子，凡是后生学子，他都热心提携。作为老一辈中国教育史学家，他始终是研究生的拜访对象。南来北往的出访研究生在他门上常是络绎不绝，而他总是热情接待，诚恳地答疑解难，全忘了自己是个年近80的老人了。就这样，他甘当人梯，让后人攀上他的肩膀。直到去世，他还在带研究生，至死都未曾离开他深爱着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教书育人的岗位。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沈灌群晚年还担任了很多校内外的学术职务，参与了学校和国家的教育、学术发展事业。他担任教育系和华东师大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出席1979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担任过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他还是中国教育史研究会筹备发起者之一，以后并任研究会理事，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还是国家重点项目《教育大辞典》以及《中国教育史研究丛书》的顾问。

沈灌群自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此心一生未泯，而且老而

弥坚。从1956年到1987年的30余年间，他先后四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表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的追求。1987年3月26日，教育系党总支会议通过沈灌群为中共预备党员，次年3月中共华东师大党委又批准他为正式党员。

1989年2月25日上午9时，沈灌群因心力衰竭，坐在沙发上安详地长逝。人们无不为一代著名学者和良师益友的永逝而深感痛惜。

然而沈灌群先生是可以感到欣慰的，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毕竟是硕果累累且后继有人。恰如他的学生们在敬献给他的挽联中说的：

一卷发先声学苑肇基壮心未已集群力史传梓行
半纪育英才教坛施露终身不倦送春风桃李纷放

序

毛礼锐

灌群先生不幸辞世已一年有余，缕缕哀思仍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今读先生《论稿》，更唤起我对其人品和学识的追忆和倾慕。

灌群先生生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家境又颇清贫，全凭顽强拼搏和不懈奋斗的毅力争得求学的机会，因此深知穷苦大众求学之不易，也因此而立志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当年我读过他的第一篇教育论文《今后中国的新教育和中国的教育者》（见《中华教育界》），曾深为感动，并视先生为同志好友。

抗战期间，灌群先生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任《高等教育季刊》编辑，我曾撰稿于该刊，得其珍助，拙文问世，成为我早年发表的文稿之一。今日想来，我与灌群先生相识和交往可谓久矣。

新中国成立后，灌群先生由复旦大学转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由辅仁大学转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共同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共同探讨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教育史学科的道路。灌群先生孜孜不倦，严肃认真，精心钻研，建树颇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工作者之一。《论稿》中大量论文和著述，记录了他辛勤耕耘的腳步。

十年浩劫，灌群先生横遭身残心碎之苦，但信念不变，志向不移。劫难殆尽，即刻奋起，以“伏枥老骥，志在千里”，“劫余甘为人梯”之精神，著述不已，迎来了一个丰收的金秋。至逝世前的十年间，发表论文和专著近40万言。

1983年起，我和灌群先生分别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教育

出版社之邀，主编《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和《中国教育家评传》（3卷本）。五年间精诚协作，相互鼓励，共同切磋，顺利成书。

灌群先生不仅学识精深，而且人品高贵。他谦逊质朴平易和善，献身事业，淡于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堪称青年之良师，同仁之益友。我赞誉他的学识，更敬佩他的为人。

灌群先生虽告别人世，然其风范永铸，著述长存。

《论稿》出版，我愿为之作短序，以寄托不尽的哀思。

1990年12月于北京师大

小红楼寓所

目 录

今后中国的新教育和中国的教育者·····	(1)
书法进步与练习时间分配之关系·····	(11)
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与精神修养·····	(28)
1940年度统考录取学生成绩之初步研究·····	(38)
论师范学院实验学校·····	(52)
论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联系·····	(61)
我国中等教育之史的检讨·····	(75)
我国医药教育之史的发展·····	(111)
法国教育问题及战后的教育改革·····	(130)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英国教育·····	(141)
西洋各国强迫教育的发展与现状·····	(158)
墨西哥人民的教育·····	(185)
苏联教育之史的发展·····	(197)
今日之教育(节选)·····	(220)
论大学校院的教与学·····	(226)
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草案)·····	(236)
鲁迅的教育思想(节选)·····	(242)
《学记》——中国古代学校的教育和教学经验总结·····	(271)
杰出的教育家郑玄·····	(279)
王充的教育观点·····	(288)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	(315)
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教育活动和教育观点·····	(337)
朱熹的教育思想·····	(357)
唐代科技教育述略·····	(373)

班昭与《女诫》	(380)
略谈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	(388)
夏、商、西周奴隶制社会的教育	(392)
周秦之际中国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发展中的教育	(428)
北宋著名的教育家胡安定先生	(448)
龚自珍的“经世致用”的教育观	(453)
魏源的“经世致用”的教育观	(463)
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观	(480)
[附录] 沈灌群教育论著总目	(492)
编后记	(496)

今后中国的新教育和中国的教育者*

在没有讨论“中国的”新教育“是怎样”和“怎么办”的这个论题以前，我们须得翻开中国教育史来检阅一下。在已往的历史上所晓示给我们的事实，和教育上所遵循着的途径，实多令人失望令人引为缺憾之点。大家知道已往的中国教育，是镣铐在传统观念的圈子里面的。它是以知识的积累为尽了教育的能事；它是被人们利用着做什么“达其所大欲”的终南捷径——这里所谓“大欲”，便是指升官发财耀祖荣宗的欲望；它是被利用做爬到政治舞台上的阶梯，是被假藉着装起“像煞有介事”的面孔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蒙混人家视听的工具。而这一般如明清以来所谓进过学中中了举的人们，除了在政治漩涡鬼混，为统治者阶级捧场，向黄金老板献殷勤外，便是一辈子的无法谋生、无地找面包的束手待毙的饿殍了！他们终日终岁所从事所致力者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死的符号知识，他们因奋勉而获得的结果，不过形成蓄废纸的竹篓，其最上乘的人物，亦不过相当于编过目分过类的两脚书橱！他们的努力分数不可谓小，但是他们所悬想着的“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却始终在悬想着，而绝未与所谓“国计民生之发展”有宣告结婚的一天！这样递演下去的结果，便促成了教育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分家。然而，在那一般朝夕孜孜缘木求鱼的老学究的昏聩脑袋里，还是彻始彻终地堕入五里雾中，他们不明白教育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有怎样的关系，也不明白所谓以政治、经济、社会做基点的教育，又是怎么回事啊！郑板桥先生有一首诗，便可写照出旧教育所产生的效力之一端：

* 此乃作者大学二年级时的处女作，原载《中华教育界》第18卷第7期，1930年。

“臣幼读书史，散漫无主张，如收败贯钱，如撑断港航，所以遇繁剧，束手徒周章！”

从这六句诗里，给了我们办教育和学教育的人一个深刻而又惊人的结论。这明白的宣布了数千年来的传统教育，甚至近30年间的所谓新教育，是失败，是错误，是不能适应“变化的生活”的装饰品；是静的，是落伍的教育。此所以明清以降，所谓教育仅仅充当了政治上支配阶级欺骗民众，愚弄民众的妙品；而不能把政治和教育间的正当关联尽量地发扬。这样的教育又有甚么意义？有甚么价值？所以我们觉得超社会超政治的玄虚的教育，绝对不是也绝对不容在新中国的新教育旗帜下呼吸着，存在着；同时，我们更要“谨防扒手”似地来避免不肖的支配阶级，将它利用做自私自利的工具，而掠夺了全体民众的利益，因为治者阶级老是以愚民政策来维持他个人的权威而遏止一般人的反对的思想的啊！兹请略述中国传统教育的大概，来作为本文讨论的先决步趋。

※

※

※

清季以前的中国传统教育，不消说只是封建社会的贵族阶级和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护身符。那时所谓整个的教育，是以这人为唯一的对象。在百工庶民的行列中假使而亦有愿亲近书史，或是对于所谓“道德文章”有浓厚兴趣的朋友，充其量亦不过受所谓“治于人”的训练；而况执此“治于人”的训练之讲师，又多半是三家村里具着冬烘头脑的“老童生”呢！故当时所谓平民教育，原不外“以敷教为施政之本”用以化民成俗，易于统治已耳！所谓庠序学校之教，除“教以耕作，训以人伦”，俾成为驯顺的被支配阶级外，便更无他求了！自秦以后，教育的特权，既旁落于士大夫阶级的掌握，他们遂独占知识，垄断教育，以充他们自身——优闲阶级的专利品。干脆的讲：自秦迄清，几千年中之所谓教育，早失去了他的本质作用，而变为构成或取得士大夫身分的必要条件与工具。一切的选举，一切的学校，无非